

# 《紅樓夢》在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之地位及中文西譯之干擾因素

古孟玄

文藻外語學院

本研究將以 Even-Zohar 之多元系統論為理論依據，檢視《紅樓夢》之西班牙語譯本未能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占據中心位置之原因。並從《紅樓夢》西譯本出版的盛況，及西班牙漢學發展的情形，提出多元系統論未提及的「政治」及「權力」等干擾因素。

關鍵詞：紅樓夢，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

## 壹、前言

以色列文化學者埃文－左哈爾<sup>1</sup> (Itamar Even-Zohar, 1939) 於 1979 年將多元系統理論的概念引進翻譯學研究的領域。他提出以多元系統理論來研究翻譯現象，為翻譯學理論帶來新的研究方向。是年 *Poetics Today* 學刊的第 11 期第一卷即以 *Polysystem Studies* 為名，除了介紹多元系統理論外，並且將其引進翻譯學研究之範疇。多元系統理論將文化現象視為一個動態的系統，其下又分為社會、文化、語言等多個子系統，每個系統都是動態的，彼此相互影響。在文學這個多元系統內，翻譯作品占據的位置視周遭的社會環境而定。埃文－左哈爾認為若是略過翻譯作品和社會環境的關係，對於種種翻譯現象的研究便難以深入探討。埃文－左哈爾的研究背景原為其母語希伯來文的翻譯，然其引介之多元系統研究卻一直被引用至今，由於此理論以譯本及其相關社會背景為探討重點，其客觀性不但使翻譯學擺脫直譯意譯這紛擾不休的兩難話題，也使翻譯研

究跳脫長久以來原文高高在上的桎梏。

臺港兩地關於多元系統理論的研究算是蓬勃，然研究或著述在這方面仍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較具代表性的為張南峰教授，曾將埃文－左哈爾對翻譯學多元理論的見解節譯成中文（埃文－左哈爾，2002），並從多元理論的角度分析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張南峰，2001）；莊柔玉亦曾以此理論為基礎分別對港臺兩地的連續劇收視率作出詳盡合理的分析（莊柔玉，2001a），並探討中文聖經多元系統的演進（莊柔玉，2001b）……等等。

此文將以埃文——左哈爾之多元系統理論，佐以個案分析。除探討《紅樓夢》西班牙語譯本在西班牙乏人問津的原因，並藉此印證多元系統理論確有不足之處。可分為三個部分：

1. 理論部分：此章節首先簡單介紹埃文－左哈爾的學術背景，詳盡說明多元系統理論；另一部分為翻譯學多元理論的本質：翻譯學與多元系

<sup>1</sup> 本文所提及之人名中譯優先原則為參照已出版之文獻，或由網路搜尋，再者為筆者所譯：Itamar Even-Zohar 及 André Lefevere 之譯名均根據《西方翻譯理論精選》；Viktor Shklovsky 之中文譯名參考網路翻譯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ktor\\_Shklovsky](http://en.wikipedia.org/wiki/Viktor_Shklovsky))；南美譯者 Mirko Láuer 的中文名字則為筆者所譯。

通訊作者：古孟玄，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文藻外語學院西班牙文系。E-mail: menghsuanku@hotmail.com

- 統理論的關係，以及此理論的侷限與影響。
2. 背景介紹：此為個案分析的基礎。分別介紹  
(1)《紅樓夢》西班牙語譯本；(2)西班牙文學史；(3)西班牙漢學發展史。
  3. 分析部分：從多元系統理論出發，自西班牙文學發展的角度：(1)檢視翻譯文本無法在西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的原因；(2)提出「政治」及「權力」也是研究翻譯文學的重要考量。

## 貳、理論框架

### 一、多元系統

埃文—左哈爾的多元系統論有三組相對的概念：

#### (一) 經典化 vs. 非經典化

經典化的概念為蘇聯學者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1893-1984）的理論，並非埃文—左哈爾所提出（莊柔玉，2001b：44）。經典化和非經典化的對立關係說明的是在一固定時點，某文學作品受到統治階層重視，而享有其正統的地位，也就是所謂的經典化；或者是相反的情形，也就是所謂的非經典化。因此，經典化和非經典化說明的是文學作品的地位問題，無關其文學本質的優劣。享有正統地位的經典化文學作品固然不至於粗製濫造，但非正統的非經典化作品其品質也未必低劣。此時此地的經典化作品，若易地而處其經典化的地位便有可能動搖，這種現象正說明經典化和非經典化的對立情形並非由作品本質決定，其關鍵在於周遭的社會環境。

#### (二) 中心 vs. 邊緣

中心與邊緣在文學多元系統的對立關係，多被援引於多元系統中外來的文學勢力（例：翻譯文學）和本國文學的相對關係。根據埃文—左哈爾的說法，翻譯文學多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因為只有當文學多元系統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時，翻譯文學才有可能占據其中心位置；而在任何多元系統中，畢竟穩定的情況才是常態。然而中心的概念和經典化卻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翻譯作品占據多元系統的中心，意味著本國文學處於弱勢，但不表示此翻譯作品同時具有經典化的特質。

#### (三) 一級 vs. 二級

一級和二級形式庫所代表的為革新和保守的對立。當一個多元系統的文學模式不斷更新，表示此時一級產品不斷推陳出新，而過時的一級產品自然就進入二級形式庫中。一級至二級的轉換過程為創新至保守的遞嬗關係，誠然，這種關係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一級產品指的是多元系統革新下的產物，而二級系統則意謂著穩定的保守主義。因此，二者之間的關係也意謂著系統內階級之間彼此的互動關係。這二種形式庫的對立和經典化與否並無對號入座的直接關聯。也就是說，一級形式庫並不一定等同於經典化形式庫，經典化的產品很有可能是二級的保守形式庫的產品。

## 二、翻譯與多元系統

翻譯作品在譯語文學系統中多居於邊緣地位，原因正如埃文—左哈爾所言，即使譯入語文學系統曾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但這個「不穩定」的狀態畢竟不是一種常態。也因此，翻譯文學一般而言能占據中心地位且主導譯語文學模式的機會並不多。翻譯作品占據譯入語文學中心位置的機會有以下三種情形：

#### (一) 文學發展處於初期階段，尚未確立。

此時翻譯作品能為譯語文學提供參考的文學模式；這些由翻譯作品帶來的文學規範同時也滿足了讀者群的需求。

#### (二) 文學處於邊緣或弱勢的情形。

這類情況尤其出現於西方國家，以歐美國家作品為譯出語的翻譯作品，在文學系統不夠穩固的弱小國家，很容易就進入其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

#### (三) 文學出現轉捩點，危機或文學真空。

所謂的轉捩點指的是文學發展過程出現的轉變，可能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若此時出現文學真空，翻譯文學占據中心地位的機會就更大，因而為譯入語的文學多元系統帶來新的文學模式。

埃文—左哈爾認為，翻譯作品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時，翻譯作品多注重其「充分性」（adequacy），也就是以譯出語的語言系統為主，近乎一般傳統所謂的直譯：直接將文學作品以譯出語之

語言系統譯介入譯入語中。反之，當翻譯文學處於多元系統的邊緣地位時，翻譯作品多具「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譯者以譯入語系統為主翻譯文學作品。

### 三、多元理論的侷限與影響

一方面由於多元系統理論的框架相當簡單明瞭，在應用時不可避免會有些美中不足之處；另一方面，「由於研究開放的系統比研究封閉的系統困難，十分詳盡的分析有可能做不到」（埃文—左哈爾，2002：20）。其侷限性有若干學者撰文論述（Jeremy，2001；Shuttleworth，1998；張南峰、莊柔玉，2001等），茲整理出兩大點略敘於後。

首先，多元系統理論的操作方式將翻譯作品置於客觀的社會或歷史背景中分析，然而一部翻譯作品的出現，除了顯而易見的各種客觀因素（市場趨勢，文學傳統，當下政策等）之外，譯者本人的主觀意識其實也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以多元理論來探討翻譯作品雖然可以看出翻譯作品處於大趨勢下的必然性，卻忽略了譯者的主觀影響。關於這方面的例子，最明顯的為直譯與意譯之爭。同個時代，相同社會背景可能由於譯者的主觀意識而有直譯原文與保留譯入語傳統兩大背道而馳的不同看法；再者，專有名詞的翻譯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由於中西語言系統的不同，人名地名的翻譯同樣也是譯者主觀意識下的產物。

其次，客觀的分析一部翻譯作品於多元系統中的位置，及其所受的各種影響時，除以上所指出的各項客觀因素外，政治因素亦可能是影響的可能性之一。埃文—左哈爾是否因為政治的不穩定，避談翻譯作品背後的權力關係，而對多元理論與理論家動盪不安的時代背景的推測，也點出多元理論的不足性。

然而以上所提及的兩點，由於翻譯學的日益成

熟，隨之而來的各種理論都明顯的針對多元系統的各種影響元素提出討論，並因此而使翻譯學理論更趨完整。晚近出現的理論雖然已不再以「多元系統理論」為號召，但明顯的是以此理論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多元系統論給翻譯研究開闢了一條描述性的、面向譯語系統的、功能主義的、系統性的新途徑，推動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催生了一個跨國界的翻譯研究學派」（埃文—左哈爾，2002：20）。由於多元系統論強調不以文本為研究的唯一訴求，在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操縱學派便是受此理論所啟發。這個學派認為翻譯都具目的性，翻譯便是操縱，因為各個翻譯作品基於譯者賦予的不同目的，而被譯者所操縱著。其中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1944 - 1996）更將譯者的意識形態視為對於翻譯作品的重要影響原因之一<sup>2</sup>。

### 參、背景說明

我們將以《紅樓夢》西譯本為例，舉出此翻譯出版時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及其在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的地位。並以西班牙文學發展為背景，指出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的現況。最後以漢學在西班牙發展的過程，說明權力介入翻譯的可能性。

#### 一、紅樓夢在西班牙

以下根據出版時間先後，在探討譯本時將兩個西班牙語的《紅樓夢》譯本分為「譯本一」及「譯本二」。

(一) 譯本一：西班牙格蘭那達大學（Universidad de Granada）所出版之“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目前《紅樓夢》的西班牙文全譯本有 2 個版本，一為 1988<sup>3</sup> 年由 Tu Xi<sup>4</sup> 翻譯，北京大學趙振江

<sup>2</sup> 勒菲弗爾的代表作品有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1992) 以及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1992)。兩者均對系統理論之贊助人 (patronage)，詩學 (poetics)，意識形態 (ideology)，論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 等影響翻譯的因素多所著墨。

<sup>3</sup>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一二卷上書名頁並無出版年度之資料。本文所根據的資料為格蘭那達大學出版社之網頁 (<http://www.editorialugr.com/>)，兩卷皆為 1988 年出版。趙 (1990) 指出「《紅樓夢》第一卷 (前四十回) 終於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問世了 [...] 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回國之前，《紅樓夢》第二卷已經出版，尚未公開發行」。根據趙的敘述，《紅樓夢》第二卷出版時間相當可能是一九八九年。Ku (2006: 18) 所參考之出版資料為趙 (1990)，第一、二卷分別為一九八八年及一九八九年出版。

教授及José Antontio García Sánchez 等校訂之《紅樓夢》第一二卷，以及於 2005 年由趙振江翻譯，Alicia Relinque及 José Antonio García Sánchez 所校訂之第三卷，由西班牙格蘭那達大學所出版的“*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全譯本。該譯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所提供之原始譯本修訂，而此原始譯本又為米闊·勞爾（Mirko Láuer）參考數個歐陸語言譯本所翻譯的“*Sueño de las Mansiones Rojas*”（譯本二）<sup>5</sup>。

此西文譯本之主譯者<sup>6</sup>在《紅樓夢學刊》（1990）及《外國文學》（1997）中曾相繼指出“*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出版時在西班牙大受歡迎的盛況。西班牙各個報章雜誌相繼刊登書訊：文學雜誌 *Leer*（1989, nº19, p.12）及 *Quimera*（1989, nº88, p.72）都對《紅樓夢》的內容作一個簡單的介紹。除此之外還有電臺報導，此一經典遠渡重洋似乎造成不小的轟動。在簡短的報章副刊中 *ABC*（1989, *ABC* 文藝副刊）還報導著這部鉅作的完成是西班牙格蘭那達大學，西班牙文化部（el Ministerio de Cultura），安達魯西亞自治區政府（la Consejería de la Junta de Andalucía）及北京文化局等單位攜手合作的成果，可見這一翻譯作品的幕後工程之浩大。

譯文共分 3 卷，篇幅皆為 900 頁左右。根據出版社的資料顯示，第 2 卷已銷售一空，餘第 1 卷及第 3 卷也僅剩庫存的數本而已。譯本一在前言部分有出版當年（1988）格蘭那達大學副校長 Juan Francisco García Sánchez 對《紅樓夢》譯本的好評，除說明這個翻譯工作是由多個單位合作的計畫，指出“*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是《紅樓夢》的第一個西班牙語譯本外，並提到這部譯著提供西方世界

許多關於中華文化的新知識。然由於《紅樓夢》有多達 200 多首的詩歌，400 多個角色，雜揉著眾多角色的會話、敘述與詩歌的文體，不免造成理解方面的困難。（曹雪芹，高鶚，1988: 7-8）其後並有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副所長，著名的紅學專家李希凡，對《紅樓夢》這部經典長達 20 多頁的詳盡介紹。內容包括《紅樓夢》的作者、情結、社會背景及藝術價值等，但對於翻譯的部分並未提到隻字半語。

譯本一所採取的是偏向「異化」的翻譯策略；「譯文通常會緊跟原文的規範，從而緊跟原語語言和文學多元系統的規範。這種傾向埃及－左哈爾稱之為『充分翻譯』（adequate translation）。」（圖里，2000: 132）最明顯的現象為對於原文的用詞修改較少，即使譯入語中有對等的表達方式，譯文也多以描述或直譯的方法譯出。例如第 25 回中鳳姐形容賈環是「慌腳雞」，走路慌慌張張不小心。譯文直譯為“pollo de patas torpes”（慌腳雞），對於中文讀者或許不陌生，然而西文中卻無此說法。《紅樓夢》第 63 回中提及賈府的女眷性情相近者都成了好朋友，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來形容。譯文為：“las cosas de la misma naturaleza se juntan”（中譯：同性質的東西會聚在一起），卻沒有採用西語中現成的慣用語：“Dios los cría y ellos se juntan”（中譯：上帝創造了他們，他們便自組成群）。

## （二）譯本二：北京外文出版社所出版之“*Sueño de las Mansiones Rojas*”

另一部《紅樓夢》的西班牙文全譯本為北京外文出版社於 1991 年出版，由南美人米闊·勞爾所翻譯的“*Sueño de las Mansiones Rojas*”。此譯本在中國出版，由於出版社位於海外，又處於歐陸之外的

<sup>4</sup> 此譯者為虛構之人名，為西方圖書之簡稱：「西圖」之羅馬拼音 (Xi Tu) 之反序書寫。

<sup>5</sup> Ku (2006) 以“*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及“*Sueño de las Mansiones Rojas*”為語料，分析紅樓夢中語言文化元素（慣用語，文字遊戲及人名雙關語）之翻譯技巧。由於分析之案例中（共 343 條例句），兩譯本相似度甚高，因此除整理相關報導，尚包括和譯者書信往來，歸納出譯本一之原始文本為譯本二，而譯本二除以楊憲益之譯本為原始文本外，還參考其他英文譯本及義大利語譯本。然譯本二雖為譯本一的原始譯本，其出版時間卻較譯本一來得晚。

<sup>6</sup> 根據趙振江（1990, 1997），譯本一的校訂工作相當複雜，尤其紅樓夢中詩歌的部分幾乎都必須重譯。因此趙振江將中文詩歌譯出，J. A. Sánchez 修改後，尚需與詩人朋友們討論。故雖然“*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之書名頁中，趙振江和 Sánchez 都是校訂者（revisor），在文中趙卻引用多次「翻譯」兩字而非「校訂」。

亞洲，相較於譯本一在西班牙著名的大學出版社發行，譯本二卻無法在西班牙境內一般書局購得，只能透過專營亞洲或東方圖書的書局代為訂購。且此譯本已於多年前絕版不再印行。基於以上原因，譯本二在西班牙即使是有設置中文課程的大學圖書館中亦不多見。

譯本二在譯文之前僅有李希凡對《紅樓夢》的介紹，除此之外並無他人所作的序或跋。李希凡所作一文和譯本一中相符，應是譯本二在校訂時見其價值而保留下來。和譯本一不同的是，全文 120 回共分 4 卷一次出版。

此譯本之翻譯策略傾向於「歸化」譯入語之語言文化；「緊跟譯語系統的規範決定譯文在譯語的語言和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及其在該等系統中占據什麼位置。」（圖里，2000：132）因此在閱讀譯本二時字裡行間的文化衝擊也較譯本一來得少。例如前二例所舉的「慌腳雞」及「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在譯本二中或以描述的技巧譯出：“qué tal badulaque”（中譯：這個傻瓜），以及譯成西班牙慣用語 “Dios los cría y ellos se juntan”。

### （三）迴響

譯本一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在翻譯期間由於各單位贊助，又相當順利的在格蘭那達大學出版社出版，並由於西班牙各個合作單位的推動，消息在報章及譯文雜誌上刊登，此譯著轟動之程度不容置喙。相較於譯本一，由於譯本二並無跨國合作計畫提供資金或出版，甚至銷售市場方面的贊助，北京外文出版社又遠在中國，一般西班牙讀者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這部陌生的「中國文學經典」。可見權力單位的介入，對於譯注的市場效應，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紅樓夢》在西班牙出版時，曾經成為西語文學界的大新聞，各個媒體爭相報導，一度被冠上經典的冠冕，但是終究無法占據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紅樓夢》為一篇幅浩大的經典名著，或許在中文的圈子裡「紅樓夢」這三個字耳熟能詳，如今譯成西班牙文，其讀者卻寥寥無幾。西

譯本最終只在為數有限的書局內看得到，並不是在市面上隨處就可購得的，僅學有專精的漢學家，及極少數西班牙人知道這部中國經典。

在中文西譯這個文學多元系統內，由於權力單位及媒體報導，《紅樓夢》西譯本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被奉為經典。然而根據埃文一左哈爾的理論，「經典」和「非經典」兩者是政治權利所賦予的地位，並不等同於此作品處於「中心」或「邊緣」或「邊緣位置」。就整個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包含西班牙語著作及外文譯作）而言，《紅樓夢》這部作品其實是處於「邊緣」位置。不難想像在出版多年後，此譯著乏人問津的現況。

## 二、西班牙文學發展簡史

一個國家的文學多元系統穩固與否，可從文學發展史客觀地歸納出來。若是本國文學「尚未確立」、「處於弱勢或邊緣」、「出現轉捩點、危機或真空」三種狀態之一，翻譯文學便很有機會占據本國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一如清末明初之時，「中國現代文學還處於『細嫩』狀態，我國作家自己創作的現代意義上的小說還沒有出現，白話詩有待探索，話劇則連影子都沒有，於是翻譯文學便成了滿足當時新興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的主要來源（翻譯小說占當時出版發表的小說的五分之四）」（謝天振，2003：64）。

西班牙文學最初以詩歌的形式流傳，最著名的詩歌集為《席德之歌》（1140， El Cantar de Mío Cid）。此為西班牙文學的第一部文字記載作品。嚴格說來，西班牙在十世紀時便出現史詩，但直到十二世紀才將詩歌以文字記錄下來。除了英雄史詩之外，此後又相繼出現敘事詩的形式。在十四世紀，散文的形式也逐漸受到重視，然而一直到十五世紀，西班牙的文學都是詩歌當道。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世紀時歐洲人文主義開始復興，出現仿效希臘羅馬古文明的「文藝復興運動」。由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作品多為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應與宗教精神的結合，以人為本，反對以神為主的人文精神對文學作品產生了根本的影響。而「十五世

紀西班牙文學最大的特點是義大利文學的影響占主要地位」（張緒華，2000：4）。

十六和十七世紀為西班牙文學的「黃金世紀」（El Siglo de Oro），這個美名可由其豐富的文學作品略窺一二。著名的西班牙騎士小說《唐吉訶德》（*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就是十七世紀時的經典作品。十六世紀為「黃金世紀」的鼎盛時期，西班牙的屬地行跨歐美非三地。然而十七世紀時工商業蕭條，騎士小說或可喚起人民的冒險精神，重振國內低靡的氣氛。「文藝復興運動」及「巴洛克時期」為「黃金世紀」的兩大階段，除了小說之外，巴洛克時期並出現多部戲劇作品。十八世紀的國內經濟狀況受到十七世紀影響，雖然在文學上亦無偉大的作品問世，然而由於政治因素的作用，出現「模仿法國古典主義的作品」（張緒華，2000：22）。

十九世紀的文學為浪漫主義及寫實主義的結合，詩歌仍是最普遍的文學作品。西班牙二十世紀的文學受到美西一戰失利，及國內政治不穩定的影響，相繼出現「98一代」（Generación del 98）及「27一代」（Generación del 27），由愛國的知識份子所發起的文化運動。其中十九世紀末的文化界另有「白銀時代」（Edad de Plata）的稱號，與十六、十七世紀的「黃金世紀」媲美。待 1976 年專制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逝世後，西班牙的文學再度復甦，於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下，正是後現代主義盛行，各類文學作品大肆風行的蓬勃階段。

故西班牙文學系統正如其歷史一般，不論是蓬勃發展或向外吸取經驗，起起伏伏國力依舊穩固：人文主義復興之時，轉而向外吸收西羅古文明；在黃金時期創作高峰的階段，作品充斥優美的文藻……。

### 三、漢學發展在西班牙

根據 Álvarez (2005)，西班牙的漢學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討論：十六世紀以前，十六至十八世紀，以及十八世紀之後。然其劃分實可以十八世紀及二十世紀為分界點：十八世紀之前為蓬勃期，之後則為封閉期。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才又因政治因素有新的氣象出現。此種以東西方實際交流的狀況為劃分標準，更可清楚的看見兩者的關係變化。以下僅根據《西班牙漢學研究的現況》（Álvarez, 2005）概述漢學在西班牙的發展。

#### (一) 十八世紀之前

早在十六世紀之前，東西方已經有頻繁的接觸，許多文物的交流都是透過「絲路」來完成。此現象在文藝復興運動時，歐洲受東方文物影響的程度可見一斑。此時阿拉伯人在東西方交流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東方的文獻多先譯為阿拉伯文之後再轉譯為其他歐洲文字。

接著《明心寶鑑》於 1592 年以西班牙文面世：Beng Sim po Cam-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為第一部由中文直接譯成西方文字（西班牙文）的漢文著作，「內容網羅百家，雜揉儒、釋、道三教學說，是流傳海外最古早的童蒙書，善書之一」（劉莉美，2005：121），譯者為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o，1546-92）。《明心寶鑑》介紹了許多中國的思想，高母羨將此譯本送給當時的西班牙國王 Felipe II，便是希望當政者能對中國有更深入的認識，不要草率地決定侵略中國。

當時西班牙政體為政教合一，許多西班牙傳教士同時也扮演大使的角色。他們以西文書寫，介紹東方文化，或以中文書寫向中國人介紹西方。關於中國的作品其目的若非作為傳教之用，則是獻給國王參考，彼時漢學在政治上的意義遠較學術傳播來的重要<sup>7</sup>，許多介紹中國的文獻是國王決策時的依據。

#### (二) 十八、十九世紀

<sup>7</sup> 傳教士所書寫關於中國文化的作品之中，亦有著作之性質較個人遊歷的經驗更有價值，並非僅為所見所聞罷了。例如：Martín de Rada (拉達，1533- 78) 所著的“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中文詞語與習得）介紹中文，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門多薩，1545-1618) 所撰的百科全書“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China”（中華大帝國史）被譯為多個歐陸國家的語言（Álvarez, 2005）。

十八世紀以降，西班牙的國力逐漸削弱，對亞洲的掌控能力大不如前。也因此，這個階段的漢學著作幾乎是語言學習的書籍。西班牙的傳教士們出版中文學習的字典和讀本，以便傳教時能和當地居民達到充分的溝通。到了十九世紀之後，由於西班牙內部政局不穩，漢學研究於是呈現停滯的狀態。

### (三)二十世紀以降

二十世紀之時，一方面中國因為毛澤東的專政，長久以來封鎖對外關係；另一方面西班牙也因佛朗哥的獨裁，「反共」的聲浪四起，中國和西班牙的交流於是延續上個世紀以來處於停擺的狀態，並無顯著的進展。二十世紀下半葉之後，隨著專制政體的瓦解，中國和西班牙漸趨開放。今日的西班牙和中國交流愈趨頻繁，尤其是在經貿方面的往來更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語。東方研究中心的成立，漢語學習與中文翻譯課程更令西班牙學生趨之若鶩，在在都證明「中文」在西班牙日漸受歡迎的程度。

## 肆、西班牙文學之多元系統 vs. 中文西譯之干擾因素

在此，我們將以多元系統理論來分析紅樓夢西譯本無法占據西班牙文學系統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文西譯的干擾因素。

### 一、譯語文學無法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

這個部分將以埃文－左哈爾所提出的三項譯文占據本國文學系統中心的標準，來檢視西文版的《紅樓夢》無法在西班牙文學這個多元系統樹立其中心地位的原因：

#### (一)西班牙文學發展已臻成熟

從西班牙的文學史看來，西班牙文學在十五世紀之前就已經發展成熟，故在十六及十七世紀時達到顛峰，也就是所謂的「黃金時期」。因此就文學

發展而言，西班牙文學並非處於初期發展的階段。

#### (二)西班牙本國文學處於中心位置

縱然二十一世紀為後現代主義時期，五花八門的形式作品隨處可見，就文學多元系統來看，西班牙本國文學相當強勢，外國文學譯作在此並沒有喧賓奪主的能力<sup>8</sup>。

#### (三)西班牙文學系統穩定

就西班牙文學史來看，最明顯的「轉捩點」為文藝復興時期受到義大利文化的影響，以及十八世紀時法國文化的風行。然而所謂的「危機」或「真空狀態」並不存在於西班牙文學史中，更遑論當下的西班牙文學內容豐富，創作形式多樣。故西班牙文學系統的穩定狀態，亦是翻譯文學無法取代的原因之一。

## 二、「政治」、「權力」 vs. 翻譯多元系統

縱然「紅樓夢」未能占據譯語文學的中心位置，卻也轟動一時，被奉為經典之作；另一方面，現今西班牙的漢學逐漸蓬勃，中文的翻譯作品正由邊緣朝向中心移動；而回顧過去西班牙漢學史，中文的翻譯文件亦曾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其中的原因正是多元系統理論未提及，卻一直都存在的「政治」和「權力」兩者的影響：

(一)當西文版的《紅樓夢》問世時，由於安達魯西亞自治區政府，以及格蘭那達大學大肆鼓吹，因此消息遍布各媒體。這個現象足以說明「權力」能將翻譯文學短暫的「經典化」。雖然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經典作品，終究沒能在西語文學中占有永久的經典位置。

(二)中國對外開放，尤其在經濟方面猶如明日之星，商場上皆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西班牙企業紛紛與中國合作。西班牙

<sup>8</sup> 根據西班牙文化部（Ministerio de Cultura）統計資料顯示，近五年登記有案以西班牙語書寫出版的書籍分別為 54,160 冊（2002 年），59,748 冊（2003 年），59,142 冊（2004 年），57,779 冊（2005 年），58,700 冊（2006 年）。中文西譯的書在翻譯類被歸在「其他語種」（otras lenguas），被劃分在英、法、德、俄、拉丁、希臘等語言之外。這些「其他語種」的書籍，於近五年在西班牙出版的數量分別是 385 冊（2002 年），518 冊（2003 年），911 冊（2004 年），998 冊（2005 年），1,223 冊（2006 年）。雖然此類翻譯圖書出版數量有增加的趨勢，和西語書籍比較仍有相當差距，況且自中文譯為西文的翻譯作品只是「其他語種」這一類的一部分。即便是西班牙翻譯書籍的大宗：英文西譯的作品，其數量在近五年也僅為 10,000 冊左右，還是有成長的空間。

政府亦在對外政策方面對中國多所關注，「政治」因素摻雜其中。隨之而起漢學的發達，中文翻譯作品快速的增加，「一級模式」的快速催生，便成為必然的結果。

(三) 此外，回顧十八世紀之前西班牙國力強盛，與中國往來頻繁。最初是傳教因素，後來夾雜著政治的需要，中文文件被譯成西班牙文，以作為國王決策的資訊來源。在西班牙的「黃金時期」，出現中文西譯的著作，這些翻譯的文件在整個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悄悄往中心移動，無疑的也是由於「政治」因素的主導。

## 伍、結論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觀察，《紅樓夢》西譯本無法在今日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是由於譯入語的本國文學系統並未符合 Even-Zohar 所提出的三個要件。根據此結果客觀的推斷，以及西班牙文化部登記有案的翻譯作品數量顯示，不僅是《紅樓夢》的西文譯本，目前一般的翻譯文學在西班牙文學多元系統均不易占據中心位置。

其次，多元系統理論雖涵蓋譯入語系統的文學背景因素，卻忽略「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種種可能影響。除本文在第三節第二部分所提及的「政治」及「權力」等因素，尚有出版社（贊助者）及譯者個人的「意識型態」等等，亦是完整的探討翻譯文學所不可或缺的考量。

即便目前翻譯書籍處於邊緣位置，在西班牙書市中翻譯作品不但有成長空間，且接受度也越來越高。何類作品為目前市面上中文西譯的主流，出版社對這些譯作的訴求為何，譯者在這些不同類型的翻譯作品中扮演何種角色，讀者又對這些譯作有何期待或迴響，這些都是在討論中文西譯時環環相扣值得深思的幾個議題。

## 參考文獻

- 方夢之（編）（2004）。譯學辭典。上海：上海外教。
- 游淳傑譯（1993）。白安茂著。西班牙文學史。台灣：茂昌圖書。
- 莊柔玉譯（2000）。埃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著。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頁117-123）。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張南峰譯（2002）。埃文－左哈爾，伊塔馬多元系統論。中國翻譯，23（4），19-25。
- 張南峰（2001）。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外國語，4，61-69。
- 張南峰，莊柔玉（2001）。多元系統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外文學，30（3），7-17。
- 張緒華（2000）。20世紀西班牙文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 莊柔玉（2001a）。臺劇《神鵰俠侶》在香港－跨媒體翻譯個案研究。中外文學，30（3），151-172。
- 莊柔玉（2001b）。經典化與穩定性－管窺中文聖經多元系統的演進。中外文學，30（7），57-76。
- 雷孟篤（Álvarez, José Ramón）。西班牙漢學研究的現況。未出版之研究報告。
- 翁均志譯（2000）。圖里（Gideun Toury）著。文學翻譯規範的本質和功能。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頁128-140）。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趙振江（1990）。西文版《紅樓夢》問世的前前後後，紅樓夢學刊，3，323-329。
- 趙振江（1997）。架起心靈中的彩虹—漫談《石榴城》，《紅樓夢》和加西亞·洛爾卡。外國文學，3。
- 劉莉美（2005）。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中外文學，33（10），121-131。
- 謝天振（2003）。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領域的拓展。外國語，4。
- Alberich, E. (1989).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 I ). Quimera, 1989, 88.
- Cao, Xuequin, Gao, E (1988).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I, II* (Tu Xi, Trans.).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 Cao, Xuequin, Gao, E (1991). *Sueño de las Mansiones Rojas* (Mirko Láuer,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Cao, Xuequin, Gao, E (2005).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III* (Zhao Zhenjiang, Trans.). Granada: Universidad de

- Granada.
- Editorial de Leer (1989).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memoria de una Roca). *Leer*, 19.
- Even-Zohar, Itamar (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etics Today*. 1990, 11.1.
- 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Ku, Menghsuan (2006). La traducción de los elementos lingüísticos culturales (chino- español). Estudio de 紅樓夢 [Sueño en las estancias rojas]. Universita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Barcelona.
- Lefevere, A. (1992a).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a. A sourcebook*.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Lefevere, A. (1992b).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Marco, J. (1989).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 I ). *ABC*, 4. 1.
- Munday,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huttleworth, M. (1998). Polysystem Theory. In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初稿收件：民國 96 年 8 月 2 日  
 完成修正：民國 96 年 9 月 5 日  
 正式接受：民國 96 年 9 月 17 日 ■

# The Posi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Polysystem of Spanish Literature and Interference Factors of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Spanish

Meng-Hsuan Ku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en-Zohar's polysystem,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the Spanis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an't occupy the center position in the polysyste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also raised other interferenc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and 'power' that are not mentioned in polysystem theory through studying the spectacular publication of Spanis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inology in Spain.

Keywords :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panish literature, polysystem